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及战争之后的中国

〔苏〕阿·伊帕托娃　　尹怀邦译

这篇文章是根据苏联档案馆的资料。这是些什么资料？作者是谁？

在17世纪末叶（康熙时期），北京出现了一批俄国人——清军的俘虏，东正教的教徒。他们在远离祖国的地方生活，没有自己宗教和教堂是不可思议的。他们带来了自己的神甫。这样，在北京就有了第一个东正教的小教堂。1727年，俄中《恰克图条约》（第五条）正式肯定了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教士团的地位，并规定了每批人员在中国逗留的期限是10年。在1861年以前，教士团实际扮演了俄国驻中国的外交代表的角色。其他任何国家在这里还没有自己的常驻代表。18世纪——19世纪，俄国的大部分中国问题学者都是从北京教士团中产生的，他们在俄国和世界的中国学历史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所有这些都说明教士团的资料的独特性，无论是科学著作还是正式文书或私人笔记。

19世纪中叶，教士团人员定期（每年4次从北京到彼得堡，再从彼得堡到北京）将正式文稿寄往俄国及其外交部，以及各种科研机关和实际工作部门。现在这些资料都保存在我国的各种档案馆中。主要收藏在苏联外交部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АВЛР）和列宁格勒中央国家历史档案馆（ЦТИА）中。除官方邮件外，寄往俄国的还有北京教士团人员写给亲友的私人信件。这些信件有一部分也保存在档案馆中。

1840年，即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那年，进行了教士团人员的例行轮换。以波利卡尔普·图加里诺夫（ЛОГИКАРП ТЎГАРИНОВ）为首的第十二批教士团人员来到北京，其中有很多后来成名的中国问题学者。为了陪同第十二批教士团人员来华及将第十一批人员送回国，派遣了俄国外交部的一个官员，即后来担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不久又担任司长的Н·И·柳比莫夫。我所以举出这两个名字，是因为我的文章是以他们的材料为基础。他们在中国见到了什么？对当时发生的事件他们是怎样理解的？他们在向彼得堡的报告及个人的笔记中又写了些什么？

虽然北京教士团人员注视着中英冲突的发展，但是，在远离军事行动中心又几乎不出北京的情况下，他们缺少关于战争进程的情报，而官方消息在《京报》上不常出现，并且不总是可靠的。例如，在从Эрца驿站传来的最初的一个报告中（1840年8月30日）柳比莫夫写道："关于对英战争的情况一无所知，中国官员避免谈论此事，而在蒙古百姓中只流传一些关于战事的模糊传闻，他们甚至连跟谁开战都不知道。"已经到达北京的Н·И·柳比莫夫在笔记中写道：清朝统治者"小心隐瞒，在报纸上几乎不发表任何对英战事的消息"。教士团人员证实，清朝政府没有正式通报关于定海陷落之事，在向彼得堡的报告中俄国代表只说通过私人他们才有所闻。琦善与英国人谈判的过程和结果也严加保密。因此，在有大量文献说明英中冲突的外交和军事方面的情况下，苏联档案馆对这些问题原则上没有提供什么新材料，就不足为奇了。但如果因此就认为他们对此事不感兴趣，那是不对的。他们报道了一系

列新的事实，对众所周知的1840——1842年中英战争史作了补充。现举例说明其中两件事。

英国外交部长巴麦斯尊向中国海岸派遣和装备武装考察队时，交给考察队的指挥官一份向清朝政府提出的所谓巴麦斯尊照会。1840年8月15日英国人把这份文件转交给中国方面，要求在10日内答复。在说明这一事实时，很多史料和文献或者肯定照会是用英文和中文写成，或者根本不涉及这个问题。更有甚者，有的文献说照会的英文本之后附有中文翻译。大家知道，与武装考察队同时，西方的传教士也来到华北，他们在中国生活多年并通晓中文。俄国教士团人员报道：据中国官员说，英国人只递交了照会的英文本。满清朝廷不得不请求俄国教士团把巴麦斯尊照会译成中文，教士团人员认真地完成了这一工作。

苏联档案资料所证明的另一件事也值得注意。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以1842年8月29日在南京签订中英条约而结束的。1842年9月15日清朝皇帝批准了南京条约。几乎在所有描述英中战争的书籍中都是这样引证这一事实的。但是，在俄国教士团的资料中有这样的报道，即清朝政府在战争结束后长时间内对中国人民隐瞒了南京条约的苛刻条件。据教士团人员证实、《京报》上只出现了“最高当权人士”发布的消息，说什么“被战争中断的与英国人的友好关系业已恢复”云云。

1842年11月3日，即南京条约签订后过了两个月，从北京寄出的报告中，图加里诺夫还这样推测：“中国人似乎已经屈服于英国人的全部要求，据说，早已交换条约。可以认为，这是发生在8月底或9月上半月的事”。然而，不管清朝政府怎样费尽心机隐瞒南京条约，关于谈判的一些情况及条约的条件还是透露出来了。

法中谈判和美中谈判在更加保密的情况下进行。1844年11月已经签订了法中条约和美中条约，而在北京却没有任何官方消息。“上述诸事，极端保密“——图加里诺夫在向彼得堡写的报告中这样说。

在俄国教士团的资料中也注意到鸦片贸易及英国在鸦片贸易中的罪恶。教士团人员在鸦片中看到了战后年代中国贫困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中国因饥饿正在死亡，因为英国人从中国攫取了所有银子。在商业萧条，百姓贫困、欠税，面临彻底崩溃危险的政府的面前还是只有鸦片，鸦片，鸦片”。经过4个月后还是类似景象。“商业上一如既往，鸦片贸易兴旺，这是完全畅销的‘最好商品’。北京前门外已开设了很多大烟馆”。

图加里诺夫在评价1844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时写道：“只有鸦片的销售在增长，而且增长到难以置信的程度。去年秋天运到天津，从那里运到北京就有几百万卢布的鸦片”（按当时行市计算——笔者注）。”“宁波也是如此，英国人把鸦片卖给当地人，比卖手工业品还多得多。”

多年来有机会观察中国的情况，首先是观察北京的情况，观察清朝政府行动的教士团人员，一方面，多次指出了在英中战争期间以及战后年代中国的极端贫困；另一方面，也指出清朝封建官僚体制的腐败（首先表现在武装力量的状况上）。清朝中国官僚机器各个环节充满了因循守旧、无知和伪善，这使俄国人感到震惊。

我们在苏联档案中，可以找到具体生动的材料，描述当时中国的军事状况，描述那支不得不与训练有素和装备精良的英国军队作战的清军的情况。

例如，在柳比莫夫向亚洲司呈送的一份报告中（1841年1月13日）是这样描述中国的武

装力量："清政府的防务是把军队部署在整个中国的东海岸，上述情况我已经报告过（但这是什么军队！！你得亲眼看看才能对其微不足道有个准确的概念）；然后注意使天津得到更好的保卫（英国人正要向此地进攻）。近日已将北京的所有火炮，除了给首都留下必要的数量以外，都派往天津（从清朝建立以来，这些炮有很多似乎都没有人放过）。"

关于清朝政府及其军事长官在战争期间行动的"机动性"，可以根据柳比莫夫在给彼得堡的报告中所详细描述的一件事来判断，这件事就是司令官从北京出发前往军事行动的地点。"我有幸看到这个美妙的场面。将军被抬着，他的陪同人员有的乘马车，有的骑马，不算各种官员，他的随从侍者就有50人，就拿与我们教士团联系的那个官员来说，他与将军一起出发，也带了约10人，有的人拿弓，有的拿箭，有的拿床垫、枕头，等等。我国如有人接到命令要出发，骑上马就走，而这里不是这样，你等着听童话吧，而事情得慢慢做。譬如说，将军打算到前线去20天，而抬他就得抬30天，这还是因为按最高命令，一昼夜必须走两站路程。"

无论是官方文书还是个人信件，柳比莫夫都经常提到当时中国人民和满清政府之间矛盾尖锐化的情况。"清政府鉴于英国事件及普遍事务的需要，处心积虑地只忙着一件事：怎样欺骗自己的人民（上帝保佑，不是欺骗外国人，而是欺骗自己的臣民）。对清政府来说，最重要的是在人民眼里不失去其尊严。"

根据柳比莫夫个人档案中保存的笔记判断，当时中国相当公开地对满清统治表现出否定态度。1841年1月13日他在写给彼得堡的报告中已经做出完全肯定的结论：中国可能发生政治革命。"对于满清政府而言，根本的危险还在于不要发生任何内部动荡，因为其结果可能成为强烈的政治革命。所有这一切在目前开始紧张起来的情况下不是不可能的。"

在图加里诺夫写给彼得堡的柳比莫夫的私人信件（1843—1849年）以及官方报告中，经常读到关于中国民间骚动以及中国农民自发性反抗运动的消息。

早在1846年，教士团团长客观地评价了中国的内部形势，预见到日益迫近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图加里诺夫在1846年7月26日致柳比莫夫的信中写道："我不想预言，怕说不对头。但在中国确有某种重要事件在酝酿中。在过去几年，各地就发生过秋季暴动，规模还不小。大概在目前征收地租之时还会不断出现，直到全中国都发生暴动。"

1846年，在致柳比莫夫的信中，北京教士团团长说明了英国在中国的政策并得出结论，认为还会发生英中战争。"去年夏天，他们（指英国人一笔者注）到了朝鲜，但由于清政府对朝鲜出主意和坚持要求，他们在那里毫无结果。从这一点您可以看出，他们在世界上到处游荡，诡计多端，提出各种借口，窥视四方。不言而喻，如果中国不给予有力反击，他们将到山东、天津、朝鲜，只是我不知道是否很快就做到。贸易是我们的一种病症。"图加里诺夫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前10年就这样写道。他曾经多次提出将要发生战争这一想法。

在这篇简短的文章中我只是列举了目睹者提出的一些生动叙述，他们利用当时仅有的机会观察中国和中国发生的事件，既从内部观察，作为另一个国家的代表，又超脱地从外部观察。我认为，这种资料可以使我们感受到中国社会生活气氛，对于19世纪40年代中国所处的历史转折时期，这就有特别重要的意义。